

提升城市软实力 让基础理论研究先行一步

□ 刘士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021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布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率先布局城市软实力建设。2022年4月,济南市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市伟大。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还有很多城市以人民城市、创新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为名,不断推出有关政策举措,加快城市软实力建设步伐。

软实力:为何被称为文化软实力

在30多年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ey)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风靡世界,至今仍具有影响力。但坦率而言,不仅软实力在内涵上一直存在争议,其理论边界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中。综合中外的研究和讨论,我们认为,软实力可划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是指约瑟夫·奈的“最初论述”及各类“忠实于原作”的研究和阐述,后者则是由他本人的“后来发挥”及“众多其他领域的作者”共同建构和书写的。

关于狭义的概念,根据约瑟夫·奈的有关论述,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的方式“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关于广义的概念,在内容上则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如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思想/意识感召力(价值观)”“政策影响力”“框架(机构体制)约束力”“跨国公司控制力”的“五要素说”;如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外交政策的道义正当性”“处理国际关系时的亲和力”“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的“七大内容说”。还有把国家软实力分为“个人软实力”“企业软实力”“地方软实力”的“三分法”等。但凡不离其宗,与军事、经济、金融、科技等硬实力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构成了软实力的核心内容。这也是软实力又被称为文化软实力的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概念,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重构了国家、地区、企业的综合实力 and 竞争力要素体系,把“脱有形化、握手已违”的文化指数提升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二是开辟了不同国家、地区、企业之间竞争一合作的新领域和新赛道,极大突出了意识形

态、制度、文化、道德、审美等“无形力量”的战略价值。三是深刻改变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为全面理解和评估现实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框架。

城市软实力:一个中国式的概念和理论

在全球范围内,究竟谁最早提出“城市软实力”的概念,是一个很难稽考查证的问题。在表面上看,城市软实力的概念自然来源于软实力,前者是后者在城市空间中发展出来的新形态。但综合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看,不是西方的“软实力”,而是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软实力”,才是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城市软实力”的直接理论来源。由此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城市软实力”是一个中国式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软实力理论和战略中国化的成果。从西方的软实力到中国的城市软实力,在逻辑和历史均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构建的过程。

一是从“政治”向“文化”的内涵蜕变。在西方,“软实力”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目标是传播和推广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文化思潮,增强其对全球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中国,“软实力”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因此又被称为“文化软实力”。从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不是简单加了一个前缀,更是对约瑟夫·奈理论的重要修正,即淡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和突出“文化”。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个“西方理论”在中国最成功和最影响的领域,不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等,而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并在和同样源自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理论充分结合之后,将研究的重点从最初“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替换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审美文化、传媒文化、文化空间等。其次,随着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化研究的兴起,特别是2014年国家人文城市战略的提出和布局,直接引发了我国文化研究“第二次向西方化”,即从西方文化理论关注的文本、影像、文化产业、审美解放等,快速转移到城市文化规划、建筑设计、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城市品牌打造等应用领域。由此可知,在21世纪中国广泛使用的文化软实力,不仅与西方的软实力,也与西方的文化批判思潮有着本质差别,这是我们说城市软实力是一个中国本土概念的主要原因。

二是从“解构”到“建构”的功能变革。西方发展软实力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具有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战争的性质,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攻击、抹黑、妖魔化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目标是确立美式意识形态、文化价值体系 and 生活方式在全球的主流与核心地位,因此,西方的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解构性概念,主要功能是颠覆和破

坏。由于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世界观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观,也不符合当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思路,因此其“精华”很难在中国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建设性概念,主要功能是“对内”而不是“对外”,是“自我完善”和“共同发展”。首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尽管这同样是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提出的,但其主要内容是传承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而不是要改造或同化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但这主要是针对西方的全球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战争,是一种“迫而后动”、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而目标则是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三是从“国家”向“城市”的空间位移。立足于文明冲突的形势研判,服务于维护全球霸权的国家利益,是美国提出和实施软实力战略的初衷。而为了能够在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的新战场取得优势,西方的软实力战略往往和军事、经济、金融等“硬实力”密切结合,以“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等方式,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意图。就此而言,西方的软实力战略始终和国家捆绑在一起,并需要借助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体现出来。但在以“内”为主、以“建设”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从“国家”走向了“城市”,不仅城市成为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同时也为城市软实力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和战略机遇。

这也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建设城市软实力,出于城市“补短板”的现实需要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基础设施、经济总量、人口规模上已不输于西方城市,但城市文化、品牌、吸引力、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今天很多城市提出和布局软实力建设,就是为了弥补软环境和软要素的短板。其次,建设城市软实力,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布局和制度安排。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和“把城市建设作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到新一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把建设人文城市作为城市更新的目标之一,提出把城市建设成为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人文魅力空间,都是以城市为载体布局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千年大计的。这不仅把西方主要作为国家文化竞争工具的软实力改造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力量,同时也说明城市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中

国城市科学概念,并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总之,城市软实力在内涵和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西方软实力的“旧瓶”,而是装满了中国式城市化的“新酒”。至于城市软实力具体包含哪些方面,以上海为例,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品位、现代治理体系、创新创业生态、最佳人居环境、全球叙事能力等。但这些并不完整和全面,也是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的。

认识与实践:让基础理论研究先行一步

城市软实力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的理论问题。尽管目前很多城市都在积极布局和推进,但关于城市软实力的基础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不仅容易出现“这也是城市软实力,那也是城市软实力”等认识问题,在实践中也容易陷入“我这样建也行,你那样建也行”等困境。基于此,让基础理论研究先行一步,有助于引领城市软实力高质量发展。

一是开展城市软实力的基础原理研究。我们认为,我国城市软实力的布局建设,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考虑文化魅力、社会治理、法治环境、城市风范、人才高地等具体目标,也不是文化产业贡献率不高、城市品牌影响力不足、对外文化传播手段简单等具体问题,而是要加快加强城市软实力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研究制定科学的战略和发展规划提供支持。

二是开展城市软实力的历史发展研究。城市软实力尽管是个当代概念,但作为与城市空间、产业、人口规模等硬件要素相对的软要素,不仅在古代城市中就已存在,而且在某些阶段和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外城市史上的城市软实力进行研究总结,探寻深层次的原因和发展规律等,可以为当代中国城市提供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参照。

三是开展当代中国城市软实力建设研究。立足于我国文化城市、人文城市、文明城市等的建设实践,遵循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要求,探索中国城市软实力的政策和体制机制,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城市文明交流、加强城市文化合作、构建理想人文城市提供示范,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总之,统筹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逻辑,把握城市软实力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为更加科学地认知城市软实力的内涵,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历史发展规律,更好地指导城市软实力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人民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思想随笔

今年全国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强总理在谈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提出,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如何理解技术判断和价值判断?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从学理上作答,我们需要引入一组新的概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的。前者注重手段、条件、形式和程序,强调结果和效益的最大化;而后者注重目的、理想、内容和实质,强调行为背后真正的价值和含义。从实践层面来看,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二者互为根据、相互支撑。

更通俗一点来理解,我们可以看看今年2月,发生在浙江建德的一个故事。邹先生儿子因工作原因,需要邹先生母亲的死亡证明。邹母于1992年去世,现在的系统里根本查不到详尽资料,当地派出所民警几经周折,才通过户籍库找到相关信息。人在外省的邹先生恳请派出所把母亲的照片寄给自己,留个念想。民警了解情况后表示:照片要留档,但自己会翻拍一张,修好后寄过去。

如果单从技术判断上来看,根据过往经验、条文规定等,那么民警只需遵照所谓公事公办的程序,用一句“照片不能给,我们需要留档”就可以打发邹先生,可以说是“正确地做事”。但民警却把这种个人需求当作“分内事”,从价值判断出发,与群众共情,想方设法替群众解决困难,这才叫“做正确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之间,原罪路径,这就是创造性执行能力。

从政府行政的角度说,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在面对棘手问题时,价值判断和技术判断谁在前。显然,如果政府部门日常工作只作技术判断,一些事就容易被困。但如果一件事在价值上被认定应该做,那么剩下的,就是想想办法创造性地把事情做成,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比如跨区域医保结算,无证明办事等,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在找到解法之前就是没有现成答案,但只要本着为群众服务的宗旨,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办法总比困难多。

事实上,正确的价值判断往往来源于理想信念。“改革先锋”王伯祥,在任县委书记的五年里,为寿光留下了3.3万个蔬菜大棚,120万亩可观的棉花、盐田、虾池,4千家蒸蒸日上企业,10万多个“万元户”,为“为人民服务”是他留给家乡的遗嘱,也是这位“百姓书记”用一生践行的信仰。与之相反,今年的春晚小品《坑》讲述了一种“躺平式干部”,他们打着技术判断的幌子,实际上是理想信念不坚定,不担责、怕担责,遇事能躲则躲,能拖则拖。时间久了,不仅拖累了投资人、创业者的好感,也磨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归根结底,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关键是看能不能坚持“价值判断+技术判断”,以政策的创造性执行推进突破性实践。这启示我们,要秉着一颗充满暖意的服务之心,在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想尽一切办法啃下“硬骨头”,踢开“绊脚石”,铲除“拦路虎”,让更多的“问题”被“内部消化”。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总理讲话的原意正在于此。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年轻干部要有“出圈”思维

□ 于楠

“出圈”为网络用语,原是用来形容偶像受到粉丝圈以外的人群关注,知名度逐渐提高,进入更为广泛的大众视野,后也被引申为对原有圈子的一种突破与提升。年轻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望所在,要勇于挑战自我,主动跳出“舒适圈”,以自身具有的朝气、灵气、锐气为干事创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志气、底气、正气。

跳出“思维定势”的舒适圈,读其言更要得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对标到年轻干部队伍中,主要表现为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以业务学习代替理论学习等方面,存在浅层次、应景式、实用化学习现象,容易把不准方向、落后于时代。年轻干部正处于长本事、长才干的黄金期、关键期,一方面要发扬“挤”的精神,读万卷书“三余”、欧阳修“三上”的治学境界,把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以“见缝插针式”学习穿好基层工作“千条线”,做到时时学、处处学、事事学,积跬步以至千里,解决好“没时间”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发扬“钻”的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泛泛而谈,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理论找规律,把握其内在逻辑性、整体关联性以及现实指导性,解决“学不透”的问题。

跳出“佛系躺平”的舒适圈,得其法更要行其道。佛系躺平不仅是一种“慢性病”,于潜移默化中腐蚀年轻干部的心态,同时也是一种“传染病”,于无声无息中逐渐蔓延开来,容易出现“人传人”的裂变现象,从而影响政治生态。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宗旨观念和责任意识缺位所致,滋生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思想。正所谓“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得”,“干部”二字,干字为首,这是干部的职责所在。年轻干部要把握好成长的先后法则,牢记先吃苦后尝甜、先扎根后生枝、先有为后有位,把艰难险重任务当作检验理论学习成效的“试金石”,当作理想付诸实践的“转换器”,敢于往最高处攀登、向最深处涉险,与最强者赛跑、向最强者赶超,不断在广阔舞台上磨练新本领、实现新作为、展现新面貌。

跳出“和光同尘”的舒适圈,行其道更要正其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守住交往关不仅为个人注入了政治免疫力,更是关系到党风政风纯净与否。要把握好交往之道、处事分寸,通过“三省吾身”,即省察心态,做到快不做、慢不怨、得不宽、失不惊,增强自我免疫力;省察思想,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破除“好人主义”,时刻保持思想在线,不断净化自我、完善自我;省察言行,严格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间断地清除思想上的灰尘杂质,确保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让干净清爽成为年轻干部交往的底色。

(作者单位:兰陵县委组织部)



扫码关注
山东深观察



扫码看
理论周刊专题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 山东如何发力

□ 刘跃奎

齐鲁策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战略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些重要论述,为山东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跨越,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双重逻辑看必然性

第一,一般规律。所谓制造业高端化是指以高端要素组合为支撑,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化提升的演进过程。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四次工业革命历程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结束,它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英国以及欧洲纺织、轮船、火车等制造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870年到1914年,它以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代表,以电灯的发明为标志,推动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被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原子能、半导体、芯片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等的发明和运用。进入21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为绿色工业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核心是数字革命,生命科学革命和物理产品革命的

齐头并进,数字世界与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深度融合,从信息化走向智能化,进而形成数字化、产业数字化等新兴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从制造业高端化的视角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飞跃,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布局;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科技手段现代化,实现了工业生产从大规模定向个性化制造的转变,加速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升了研发、设计、物流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地位;第四次工业革命从“工业4.0”的支柱来看,即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区块链和大数据,已经进入由高端要素组合支撑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第二,制造业高端化提升是山东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逻辑。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制造业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制造业高端化提升也是山东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力引擎。当前,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多而不精”等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够优化,重化工业占比大、新兴产业支撑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技术创新能力偏弱,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创新人才支撑不足,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集聚发展水平不高,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尚未有效形成;传统要素制约加剧,高端要素投入组合相对不足;数字化转型亟待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尚未有效发挥,现代化新型制造业体系需要加快建立。从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面临的挑战来看,山东制造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动力加快从利用国内外技术溢出的外部带动向自主创新的内生驱动转变,生产模式加快从传统生产方式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变,支撑要素加快从以传统生产要素投入为主向以科技、管理、创新、数据、人力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为主转变。着眼于破解这些难题,应对这一系列挑战,山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聚焦打造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以新旧动能转换塑造优势为目标,加快发展新动能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破三难、优四产、促五化”的“345”推进思路,加快破解创新能力偏弱、产业结构偏重、资源要素紧张难题,以更大力度调优优化低效产能,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力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综上所述,从工业化演进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双重逻辑来看,这既是制造业高端化提升的内在要求和演进过程,也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路径和推进过程,两个过程的内在统一、良性互动,构成山东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力引擎。

推进制造业高端化的着力点

第一,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引领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必须面向制造业基础性、前沿性领域,加强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争创国家级中心,加快创新资源整合集聚。加快推进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打造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提升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力争到2025年,建设省制造业创新中心50家左右,“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2000家左右,努力打造一批集技术研发、人才集聚、成果转化、创业孵化为一体的高端综合性平台,为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提供技术平台支撑。

第二,提升产业结构层次,整体推进

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深入推动钢铁、炼化、焦炭、水泥、轮胎、化工等高耗能行业高端化提升,依据环保、安全、技术、能耗、效益标准,加大“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力度,持续为先进产能腾出发展空间。加快推动钢铁产能向沿海钢铁产业基地转移集聚,到2025年,重点钢铁产能占比达到70%以上。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聚焦纺织服装、食品、造纸、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重点产业,滚动实施更高层次的“万项技改、万企转型”,全面提升传统产业现代化水平,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力争到“十四五”末,化工、建材、轮胎、铸造、食品等行业规模保持全国首位,钢铁、有色、家电、造纸等行业规模居全国前三位,工艺现代化、产品精深化、研发创新能力、绿色发展水平进入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着力构筑支撑制造强省的新产业发展支柱。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生命科学、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及储能等领域,加快推动创新突破和融合应用,形成制造业发展新增长点,让未来产业成为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和新旧动能转换升级的开路先锋。

第三,塑强产业人才队伍,夯实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的第一资源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实施“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统筹推进企业家、经营管理人员、技术创新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能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一流产业人才队伍,为山东制造业高端化提升提供人才保障。

(作者系山东省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新动能教授)